

推陈出新 亮点频现

张遇

第二十一届中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已经完美收官。就本次进入终评的展览及最终结果，有几点感想。

第一，主办方修订初评规则后，入围终评展览代表性更强，特色鲜明，例如“传承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陈列”的入围体现出新修订初评规则的视野更为宽广。

第二，在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入围名单里，基本陈列数量比例较大。近年来，许多老博物馆开始进行改陈，吸收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辅以前新的展陈手段，其改陈成果在本次终评中得以集中体现。省级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陈包括“晋魂”基本陈列等5个，专题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陈则有“反人类暴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等2个。新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本届首次参评的基本陈列数量高达14个，包括“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等。以上基本陈列总计21个，在29个入围终评项目中占比达到72%。从结果而言，省级大馆藏丰富，经费充足，资源调动能力强，策展能力、展陈实践、宣传与社会教育都较为成熟，入围的概率更高。

第三，临时展览亮点频出。云南省博物馆的“追寻香格里拉——青藏高原东麓的迁徙史话与流动对话”可谓意外惊喜，有三大留下极深刻印象。一是展览将少数民族史诗、考古学成果与民族学资料有机结合，充满创意，很好地体现了展览“迁徙—融合”的主题；二是通过征集来自100位观众的100件展品以及重点访谈的6位观众及其40余件展品，讲述当代个体的流动与迁徙故事，注重连接当代与人，体现出深厚的人文色彩；三是展览造价较低，性价比之高令人叹服。在现场汇报时，汇报人称其为“有温度的展览”。

博物馆的收藏与展览，既是为过去，也是为未来。“山河安澜——渭水杭灌区主题展”令人感动，属于较为稀缺的、为未来收藏今天的展览。在申报材料与现场汇报两个环节中，这个展览也表现出其独特性。从展览主题上来说，它反映的是当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中的动人故事、感人事迹、人民创造，具有时代性；从策展思路和展品角度考量，展览大纲的形成基于策展团队开展的大量实地调研和田野考察，包括各相关行业的当事人一手访谈资料等，显得血肉丰满；展览的举办同时还填补了博物馆所忽视的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领域的收藏空白。

第四，考古展（包括考古类展览和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丰富多彩。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考古事业，考古遗址博物馆也纷纷新建或改陈。“历史中国 鼎铸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三星堆：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和“往事越千年——曹操高陵历史文化展”等展览，或以大量考古文物阐释宏大主题，或以具体的考古遗址为基础，发挥博物馆功能，呈现出该类展览强调调

址、文物、展览三结合的特征。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述中国”基本陈列，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展览的主标题简洁明了，隐含双关，有多重含义，较好地体现了展览主题，同时又朗朗上口，具有可传播性；其二，简牍作为文物本身，形制比较单一，必须有辅助展品、展项补充支撑，将主要展品、辅助展品结合丰富的陈列方式，方能体现文物内涵，体现出策展人的用心。作为重点展品的简牍，在展览中以不同的陈列方式呈现给观众，但都注重可及性与可看性，如成组（套）文物平置于俯视平柜，展板加文物组合布于沿墙通柜，重点展品镶于立柱面定制壁龛柜等。

第五，行业博物馆举办的专题展初具竞争力。在全国的博物馆热中，各行各业或多或少在兴办博物馆、举办展览上有所实践，虽然最终获评“十大精品”的展览中并没有它们的身影，但在入围名单中，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三峡工程博物馆的展览仍然引起关注。行业性博物馆办馆或是办展，对回溯行业历史、以行业发展呈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颇有助益，其展览内容设计、展品、宣传与教育等方面均有可能产生新意和亮点，相对文博系统博物馆展览而言，其欠缺的可能是对博物馆话语体系的熟悉及展览语言的把握。可以预见，未来行业博物馆专题展览将会成为“十大精品”的亮丽风景线。

第六，出入境展览竞争明显激烈。本届出入境展览数量增多，质量也随之提高。此次入围的8个出入境展览中，“馨香香山——陀陀艺术展”显示出深厚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从奥尔梅克到阿兹特克——墨西哥古代文明展”紧扣“玉米”这一意象，将展览这一文化交流活动衍生至中墨两国经济文化交往；“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充分发挥上海博物馆的国际交流优势和宣传能力；“河上花：中国花鸟画之道”与“丝路光华——敦煌石窟艺术特展”策展时针对特定地域观众，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丝路绮缘——中国丝绸艺术展”则以“集装箱”式的展出方式，提供了较高性价比的出境展新思路，等等。

本文中未提及的展览如革命主题类展览等也各有特点与优势，只是限于篇幅不一一点到。总体而言，特别奖、精品奖与优胜奖，都是上一年度中国博物馆展览陈列的优秀代表，限于名额，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始终有遗憾之感。未来希望能看到更多小切口式展览，关注中小馆展览和原创性强、学术性强的展览，形成百花齐放的中国博物馆展览繁荣景象。

（作者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重庆沙坪坝：

博物馆背后的数字转型密码

张小凤 赵杰昌

足不出户逛展览、“云端讲解员”线上解说文物故事、智能巡查文物现状……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张治中纪念馆、冯玉祥纪念馆等，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手段被运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博物馆背后的文化盛宴。

智慧导览实现“云”服务

在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个“VR数字展览”功能，它就像一个可随身携带的“活地图”，不仅有各大展厅的指引导览，且不少重要展品都有详细的图文音频讲解和VR全景视图。“目前，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已实现全馆虚拟VR数字化地图智慧导览，包括整个博物馆的全景航拍、线路导览、文物展示、语音讲解等，让游客身临其境的同时，也能以第三视角观看到不同的内容。”沙坪坝文管所副所长李盛虎说，馆内还设有20余个迷你展览电子屏、电子投影等多种多媒体场景运用。

沙坪坝博物馆作为一处依托文物建筑建设的中小型博物馆和遗址类博物馆，资源、场景相对受限。为此，博物馆在展览精品化、社教研学特色化、文创品牌化之外，因地制宜探索“数智+文博”创新融合方式，不断尝试线上线下与观众交互的各种可能。在推动博物馆服务智慧化、管理智能化、保护智能化的同时，让文物从“高冷范儿”变身市民游客身边可亲可感的“小可爱”，让历史文化在数字文明中活起来、薪火相传。

除博物馆本身，针对系列原策展、交流展、巡回展等，沙坪坝博物馆也同步推出线上虚拟展览，令观众能够远程参观展览，从而拓宽展览服务受众。如2024年春节推出的“年画中的移民之路——甲辰龙年新春特展”，为最大限度展示年画的鲜艳色彩及展厅的喜庆氛围，除使用高分辨率全画幅DSLR专业相机和镜头外，还利用各种专业建模软件，将现实的模型复刻到虚拟空间之中，并采用点位式漫游技术，确保在不同点位之间实现流畅的漫步转换效果，实现足不出户却身临其境的参观体验。“截至目前，沙坪坝博物馆已举办线上展览10场，累计浏览观众近10万人次。”李盛虎说。

智慧平台助力“云”守护

沙坪坝街道的巡查员定期按照文物巡查要求，仔细查看文物保护标识是否完好、文物本体是否保存完好、消防设施设备器材运行是否正常等情况，拍下相关照片，连同巡查记录一并上传至“文化·巴渝文物”文物安全监管子系统。电脑另一端的文管所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巡查记录的消息。这套系统不仅接入了“渝快政”政务管理系统，同时也将全区约50名镇街文物巡查员纳入其中，让文物巡查保护真正下沉至镇街。2024年5月9日，来自新桥街道的文物巡查员在巡查“第三军医大旧址”时发现文物保护标志遗失，立即上报系统。系统管理员随后向有关负责人反馈，5月22日，文物保护标志便顺利找到重新上墙。前后时间不到一个月，大大提高了文物隐患处理效率。

“除文物安全监管系统外，我们还针对全馆文物设立了一套安防监控系统。”李盛虎说。该系统包括红外线感应、摄像头、消防电话等多种设备，特别是红外线感应，能帮助博物馆在闭馆后第一时间发现“入侵者”。

令人惊喜的还有游客管理系统这一“智慧大脑”。目前，沙坪坝博物馆正在使用的“重庆市智慧文旅广电云”系统，通过对游客端数据的汇聚和重点指标分析，帮助博物馆管理人员进行游客画像分析，探索更好的服务方式。“就拿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来说，我们发现外地游客和附近的学生游客都很多，便分别针对两类人群定制了节假日特展活动以及社教研学活动等，让博物馆走出了一条跨界发展之路。”工作人员介绍。

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手段的运用让更多人看见中小型博物馆背后的价值，沙坪坝博物馆票务系统、安防监控系统、藏品管理系统、文物检测系统、数字展览系统等数字化基础功能不断提升游客的参观体验，让曾经“深人人不识”的文物被看见、被感知、被传承……

未来，沙坪坝博物馆还将紧紧围绕“魂铸红岩根植巴蜀”的发展战略，重点在展览的数字化展示、藏品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游客的数字化服务方面深挖潜力，探索中小型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新时代发展道路。中小型博物馆在数智赋能的不断迭代升级中，必将为古文明插上“翅膀”。

吉安青原探索“四个一”文物保护模式

方春勇 肖燕飞

“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毛泽东如此评价说。“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这是陈毅赞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壮丽诗篇。

吉安青原区是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地，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走出了20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有革命旧址旧址400多处，80%的革命文物散落在50余个庐陵古村落中。近年来，该区按照“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不断探索革命旧址与传统村落保护相结合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

文物保护与村镇发展“一图绘就”

针对革命文物广泛分布在传统村落里的实际，因地制宜，建立统一规划编制机制，将街道、乡镇村发展综合规划、传统村落建设保护规划、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和乡村旅游规划等全部纳入总体规划编制中，统一管理、使用革命文物保护及交通、水利、农业、环境保护、乡村振兴建设资金，既整合了资源，又节约了资

金，多项规划一盘棋，一张蓝图绘到底。三年来，全区60余处革命遗址获取上级补助资金8200余万元，撬动各类资金近10亿元，实现了革命文物保护与村镇发展的有机结合。

文物保护与传统村落“一体打造”

以名镇名村中的革命旧址旧址保护为抓手，确立了革命文物与名村镇、传统村落保护集中连片打造思路，高起点规划布局。充分发挥东固革命根据地强大引领作用，持续加大沿富水河流域传统村落和革命旧址旧址群旅游开发力度，在保护方式上力求高度融合，既保留符合历史建筑的传统风格风貌，又恢复战争年代的革命场景；既传承历史文脉，又弘扬红色基因，一体打造，相得益彰。目前，全区已集中打造12个传统村落，充分展示了青原深厚的传统文化及传统村落魅力，也增强了革命文物的影响力。

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一同推进”

依托文物资源，将洪波、富田、东固等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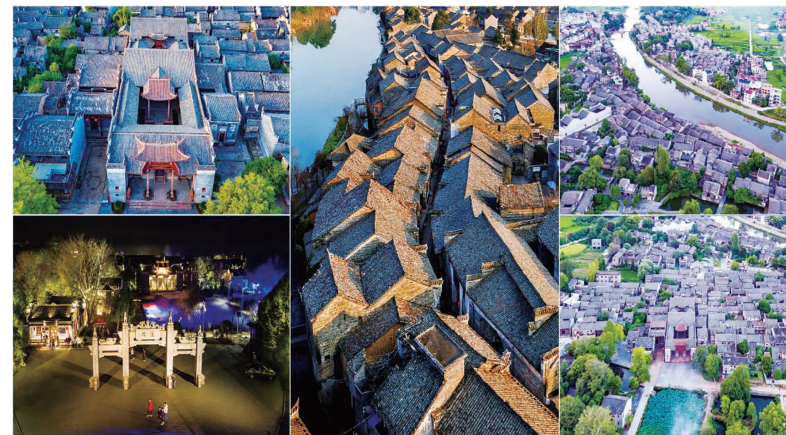
造成国家4A级景区，并开发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将革命遗址变为带动乡村旅游的新引爆点。同时，充分挖掘革命文物的资源特质，大力开发红色文化产业，将青原打造成影视拍摄基地和艺术写生基地，成功拍摄《井冈山》《红色摇篮》《爸爸去哪儿》《洪波》等10多部大型影视剧和影视节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文物保护与文化惠民“一曲同歌”

坚持以“传承为重，留住文脉，记住乡愁”为主线，革命文物保护与文化惠民一曲同歌，做到革命文物修缮到哪里，文化惠民布局就推进到哪里。修缮东固革命旧址、洪波红四军总部旧址、洪波万寿宫、富田诚敬堂等革命旧址、古祠堂、古民居、古戏台，将革命旧址打造成农家书屋、农民剧团、文体活动室、老年人活动室、农村医疗室等文化惠民场所，乡村公共文化活动现场地成为新时期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教学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东固平民银行



洪波古村



革命旧址的活化利用



乡村旅游

辩证认识“老账本”在革命文物定级实践中的作用

郑宁波

革命文物定级的准确性与定级专家对文物信息的掌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定级就是依据文物信息确认文物价值的过程。按照理想状态，摆到定级专家面前的待定级文物的信息应当是完备且准确的，但是，现实远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不少待定级文物的信息往往残缺不全或语焉不详，单凭仅有的信息甚至无法确定文物的真伪。本来，待定级文物首先应当保证是真文物，对真伪的考证不是定级专家要承担的主要工作，但不少时候，定级专家不得不首先解决真伪问题，对真伪的判断甚至成为定级专家遇到的最大难题。这种情况下，除了从材质、形制等文物基本要素入手进行判断以外，有关文物的既有信息就成了判断的基本依据，信息也就成了影响文物定级的关键因素。

面对信息残缺不全的革命文物，被鉴定方向往往采取临时补充的方式来证明文物的来源及价值等，但是，这类临时性补充的信息往往存在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收藏单位记载文物信息的“老账本”就成为定级专家青睐的信息载体。笔者在定级实践中发现，“老账本”有优点亦有不足，不能将“老账本”作为一锤定音的依据，应当辩证认识“老账本”在革命文物定级实践中的作用。

所谓“老账本”，是指收藏单位在征集和收藏文物时形成的原始记录，大部分是在收藏单位使用电子信息手段记载文物信息之前的纸质形态，大约形成于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21世纪以来，很多收藏单位开始使用电子手段登记文物信息，一些收藏单位将原纸质上的信息转化为电子信息，对于新征集的文物也从初始环节就采用电子信息登记，“老账本”退出历史舞台。管理规范的收藏单位将其妥善保存；有的干脆将其销毁，或因疏于管理而不知所踪；也有收藏单位尚未将“老账本”的信息转为电子信息。这种情况下，“老账本”就成为了解文物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对于呈现文物信息而言，“老账本”的确有其独特优点：一是具有相对原始性，相关信息往往是随着文物进入收藏单位伊始就载入账本。二是相对真实性，由于相关信息是文物征集或收藏的当事人直接提供的，只要没有造假的主观故意，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多次流转而导致的信

息错误。三是相对权威性，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要比他人的间接考证更为权威。当然，这些优点都是相对的。

“老账本”被视为了解文物信息的可靠文本，除了上述优点以外，还与两种观念有关：一是认为“那个年代”的人工工作严谨扎实，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撰写的信息是客观真实的；二是认为“那个年代”的人未受商品经济的熏染，文物工作不掺杂其他功利性因素，不会造假。在这两种观念的支配下，仿佛“老账本”所记录的信息就是完全真实的，完全不存在错误，可以作为判断文物真假和价值的权威依据。然而，实践证明，事实远比这种想象和假设复杂得多，“老账本”良莠不齐，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很多“老账本”记载的信息并不完备。“老账本”是时代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过去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加上人们对文物的认识也存在局限性，有的“老账本”材质极为简陋，只记录了文物名称等基本信息，而对于文物的年代、数量、质地、尺寸、来源、价值等基本要素缺乏必要的记载，这就造成“老账本”无法作为有效信息的提供者。如果“老账本”本身未记载用于判断革命文物价值至关重要的年代和来源等关键信息，就不能只凭某件革命文物被“老账本”收录在册，就天然地对其产生无条件的信任。比如，一件被称为地下交通员穿过的棉袄，“老账本”上只在名称栏记有“交通员穿过的棉袄”的字样，除此之外没有其任何信息。这种情况下，必须追问年代和来源两个关键信息，否则，就无法确凿判定它究竟是何年代的，究竟是不是交通员穿过的，究竟是不是用于革命活动，缺少了年代这个信息，即使属于革命文物，也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个革命时期的物件，进而无法精准评价其价值，从而无法科学定级。

第二，很多“老账本”记载的信息与革命文物真伪和价值之间未必能建立起直接确凿的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文物，成为革命文物征集的富矿。革命文物征集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计其数乃至纷繁复杂的征集过程中，谁说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紧扣革命属性、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征集而来的。定级实践中经常碰到大量刀枪炮等武

器，收藏单位往往将其陈述为革命文物。其实，在没有充分信息支持的前提下，无法判断这些武器是否参与了中国革命，不能只凭它们是否是武器就断定它们属于革命文物。比如，对于一支老式土枪，“老账本”记录的来源是“在XX村征集”，单凭这个信息就无法判断这支土枪是否属于革命文物。因为土枪虽然是村里征集来的，但是，村里征集而来与文物是否具有革命属性之间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这支土枪可能是被村里老百姓用来看家护院或狩猎打鸟的，“村里征集而来”这个信息是无法证实革命属性的。这种情况在定级实践中屡见不鲜，不能只凭某件文物上了“老账本”，或者在老账本上有个别信息，就对其深信不疑。

第三，很多“老账本”未必能客观反映革命物的实际情况。即使“老账本”记录者从主观上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旨在如实记录文物的信息，但记录者可能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如果不能对文物信息进行再考证，就只能凭他所接触到的信息形成记录，而他所接触到的信息未必能客观反映革命物的实际情况。比如，商品经济勃兴以来，革命文物的经济价值日渐被关注。革命文物征集过程中不免掺杂经济因素，且不论购买这种直接与经济因素有关的征集方式，就是接受捐赠这种看上去与经济因素关系不大的征集方式，也可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在“老账本”上有关革命文物的各项信息都完备的情况下，依然要对“老账本”上的信息做进一步的考察，首先确保革命文物的革命性和物性两大基本要素不存在任何问题。

总之，较之于后补的口述或书面证明，具有原始色彩的“老账本”在阐明革命文物的真伪和价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但是，应当认识到，“老账本”亦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对其不能无条件的迷信，不能天然地将其作为判断革命文物真伪和价值的绝对标准，而是应当辩证认识和科学评估它在革命文物定级中的作用。一言以蔽之，“老账本”可以作为革命文物征集的重要参考，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权威的依据。在革命文物定级参考的因素中，“老账本”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革命文物定级必须全面考量更多的因素。当然，那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了。